

## 為什麼是“少數民族華僑華人”？

### —一位中國學者的解答

© 2015 張振江\*

2014年4月4-5日，澳洲國立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院(Research School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at the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和中國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聯合舉辦了“中國海外非漢族裔僑民群體”(Non-Han Chinese Diasporic Communities beyond China)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澳大利亞、德國、馬來西亞、美國、日本、紐西蘭以及中國等近二十名學者參加了會議。會議地點在澳洲國立大學澳大利亞世界之中國研究中心(Australia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大樓。會議分為海外維吾爾人(the Uyghurs overseas)、伊斯蘭群體及其外部聯繫(Islamic communities and their external relations)、歐亞大陸的聯繫(Connections across mainland Eurasia)、藏族人及其外部聯繫(Tibetans and their external relations)、朝鮮和蒙古人(Koreans and Mongols)以及東南亞關聯(Southeast Asian connections)6個分組，會議論文和研討涉及了朝鮮族、蒙古族、回族、維吾爾族、藏族、苗族、壯族等，基本涵蓋了主要的中國非漢族少數民族海外僑民群體。可謂是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少數民族海外僑民的首次系統研討，具有一定的拓荒意義。<sup>1</sup>

在主辦方的精心安排下，兩天的會議進行順利，研討熱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各位學者均認識到會議主題的新穎和重要意義，甚至呼籲有必要在今後繼續召開系列會議。但像任何學術研討一樣，與會者有共識也有分歧和爭論，諸如這些僑民群體與中國的關係、他們的身份認同、他們之間的共性等，特別是對會議主題的名稱、以及對會議最終出版採用什麼樣的書名等等都存有很大的爭議。有人指出“非漢族裔僑民群體”有排他性，有人質疑能否用一個主題涵蓋那麼多不同族裔僑民群體等。

我個人以為，可以用“少數民族華僑華人”對此次會議的主題進行涵蓋。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這一稱謂更多的是在中國和中文的背景之下。印象很深的是，會議交流中，瑞德(Anthony Reid)教授提醒我在中國有不少諸如“民族 XX”的提法(諸如“民族飯店”、“民族人”、“民族學校”等等)，其中的“民族”僅指“少數民族”，似乎漢族就不是一個民族，這無疑是一種漢族大民族主義的表現。他的質詢對我不帶醍醐灌頂，但我也提醒鑒於中國民族構成的歷史和現實，“少數民族”的提法似乎更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語言習慣，未必盡含歧視之意。當然，無論是從“政治正確”還是“文化正確”來講，最恰當的自然應當分別是“漢族”、“蒙古族”、“回族”、“維吾爾族”、“藏族”、“苗族”等具體的稱謂。但再一次鑒於中國民族構成的歷史和現實、會議主題以及出版的需要，我仍認為至少中文的“少數民族華僑華人”是一種最不壞的提法。<sup>2</sup>原因如下：

第一、“少數民族華僑華人”早已經是一個出現在學術界的概念。根據李安山的研究，<sup>3</sup>中國國內學者最早涉及相關研究的是《華僑歷史》(後改名《華僑華人歷史研究》)在1986

\* 中國廣州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教授，電子郵件：[zhangzhenjiang@gmail.com](mailto:zhangzhenjiang@gmail.com)

<sup>1</sup> 張振江，“‘中國海外非漢族裔僑民群體’學術會議綜述”，《華人研究國際學報》第六卷第二期，2014年第87-90頁。

<sup>2</sup> 需要強調的是，我認為“少數民族華僑華人”更適合中國民族構成歷史與現狀，符合中文的語境和習慣，但相對應的英文“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未必最為合適，倒是會議主題的“Non-Han Chinese Diasporic Communities”更易讓使用英文的學者理解和接受。

<sup>3</sup> 李安山，“少數民族華僑華人：遷移特點、辨識標準及人數統計”，《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3年第

年刊登的兩篇關於維吾爾移民的文章，儘管兩位作者分別使用的是“各族華僑”和“維吾爾族華僑”，但當屬國內這一話題的最早宣導者。<sup>4</sup>1989年，向大有先生著文研究移居越南的少數民族華人問題，稱越南政府和學者“只將移民越南的漢人算作華僑華人”是不妥的，呼籲華人“應是中華民族中各個民族成分共同享有的總稱”。他還據此統計出越南的華僑華人應是235萬，包括遷自廣西壯族（岱族和儂族）、瑤族和苗族等少數民族約130萬。<sup>5</sup>之後，他又連續發表兩篇研究，明確使用了“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的概念。在第一篇文章中，他提出“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向國外移民，不僅有作為主體的漢族移民，而且有大量的少數民族移民，這就從歷史到現狀，構成了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群體，並成為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根據他的估算，海外的少數民族華僑華人有310余萬，包括居住在29個國家和地區的25個中國少數民族的華僑華人。<sup>6</sup>在第二篇文章中，他進一步認定那些在國外定居但仍保留中國國籍的少數民族是華僑，可在其民族名稱後加上“華僑”，如“維吾爾族華僑”、“壯族華僑”等；而對已從所在國取得國籍者，可在其民族名稱後加上“華人”，如“哈薩克族華人”、“回族華人”等。<sup>7</sup>

在他之後，其他學者開始使用和發展“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的概念。譚天星指出中國少數民族人口境外遷移包括兩部分：中國跨境（界）民族和少數民族華僑華人，後者在內涵上更豐富和廣泛，包括具有同一民族性而散居於不同國家的人，如散居在歐洲、美洲和亞洲的瑤族等。<sup>8</sup>在此之後，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研究各個少數民族的華僑華人。<sup>9</sup>趙合曼專門出版了《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研究》的專著，<sup>10</sup>李安山教授更是對“少數民族華僑華人”概念的由來、內容、人數統計以及演變等進行了系統梳理和總結，可謂這一研究的集大成者。<sup>11</sup>

3 期；《中國少數民族華僑華人：一項研究報告》，2003年8月，  
[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3-08/15/content\\_255090.htm](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3-08/15/content_255090.htm)

<sup>4</sup>黃力平：“淺述中國先民經由新疆移居中亞、西亞的開始”；王慶豐：“維吾爾華僑移居西亞地區史探”，《華僑歷史》，1986年第3期，第36-42頁；43-48頁。兩篇文章後均被收入梁初鴻、鄭民編：《華僑華人史研究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王文標題略有改動。

<sup>5</sup>向大有：“試析廣西遷徙越南的少數民族華人”，《八桂僑史》1989年第1期。

<sup>6</sup>向大有：“試論少數民族華僑華人問題——現狀與歷史的分析”，《八桂僑史》1993年第3期

<sup>7</sup>向大有：“試論少數民族華僑華人問題——不容否認和忽視的領域”，《八桂僑史》1993年第4期；

<sup>8</sup>譚天星：“現代中國少數民族人口境外遷移初探：以新疆、雲南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14-21、40頁。此文後被提交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研討會，並以同一標題被收入論文集。參見 Elizabeth Sinn, ed.,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47-461.

<sup>9</sup>這方面的研究很多，且涉及不同學科。其中直接涉及“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的包括但不限於丁宏：“少數民族海外華人研究的思考——兼談東幹人的‘文化仲介’意義”，《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梁莉莉：“寧夏回族華僑華人社會與現狀初探”，《回族研究》2012年第2期；王慶豐：“麥加朝覲與維吾爾族華僑的形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0年第4期；劉宏宇、王靜、張全生：“吉爾吉斯斯坦維吾爾華人華僑社會探究”，《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石滄金、於琳琳：“少數民族華僑華人對我國構建‘和諧邊疆’的影響及對策分析”，《甘肅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黃文波：“少數民族華僑華人与跨界民族區別芻議”，《廣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王靜：“面向吉爾吉斯斯坦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研究——以新疆籍少數民族華人華僑為例”，《新疆職業大學學報》2013年2期等。

<sup>10</sup>趙合曼：《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研究》，中國華僑出版社2004年版；趙和曼：“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研究中的若干問題”，《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4年第3期；趙和曼：“試論海外少數民族華人的若干特點”，《南洋問題研究》2004年第1期。

<sup>11</sup>李安山：“少數民族華僑華人：遷移特點、辨識標準及人數統計”，《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3年第3期；《中國少數民族華僑華人：一項研究報告》，2003年8月，

實際上, 在中國大陸學術界, 很多學者已經接受了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的概念, 諸如莊國土在統計中國的華僑華人時, 是包括“中亞國家約有 60 萬少數民族華僑華人”和“中東維吾爾華僑華人有 20 萬, 哈薩克族華僑華人 2.5 萬, 回族華僑華人 2 萬, 漢族華僑華人 15 萬。”<sup>12</sup>《華僑華人百科全書》在統計土耳其的華僑華人時, 作者寫道“據統計, 2000 年土耳其約有華僑華人 8 萬人。其中, 維吾爾族 5 萬人, 哈薩克族 2.5 萬人, 尚有少量的烏茲別克、柯爾克孜、塔塔爾和漢族。”<sup>13</sup>中國學者的努力也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注意, 澳大利亞再一起走到了前面, 澳大南方華裔研究中心在 2001 年 9 月 26-28 日主辦了題為“華人移民社群的移民身份與少數民族”(Migrating Identitie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ese Diaspora), 其中有學者對“少數民族華僑華人”有所涉及。<sup>14</sup>慢慢的, 國際學術界也開始有人注意到這一話題並使用“少數民族華僑華人”(“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的概念。<sup>15</sup>

第二、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海外僑民開始有意識地突出和注重自身與中國連結的新現象值得注意。筆者曾經在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德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地接觸到一些從新疆移居海外的華僑華人, 其中包括很多維吾爾族、哈薩克族、俄羅斯族僑民, 在日常交流和訪談中, 發現他們對故鄉中國顯示出越來越多的關注。諸如筆者在德國慕尼黑一家新疆餐廳交流時, 從新疆移民來到德國的維吾爾族老闆一直強調他是中國人。會議上一位從事中國藏族僑民研究的美國學者, 也談到了在訪談中發現藏族小商人刻意突出自己的中國性。究其原因, 我想不外乎是思鄉戀土的情節, 特別是隨着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 與中國的連結不但可以給這些僑民帶來一定的身份認同甚至是自豪感, 同時更能夠帶來實際的利益。隨着中國的經濟發展, 與中國相關的利益獲益也越來越明顯, 突出自己與中國的連結無疑可以帶來較多的機會。諸如我上面提到的那家慕尼黑新疆餐廳, 到那裡吃飯的顧客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中國人, 而這些中國人當中的大部分是漢族而不是維吾爾族, 經過詢問, 很多顧客表示來此就餐的原因在於這是中國餐飲的新疆口味, 是北方的麵食。也就是說, 無論對顧客還是對飯店老闆, 在此連接雙方是中國而不是維族或漢族。在美國, 我和一些從新疆移民來美的維吾爾僑民高端人才(高校教師、大型跨國醫藥公司的工程師等)用英文交流(他們的漢語不是很好, 而我的維吾爾語也不能自如交流), 他們也反復說明自己是“Chinese”。<sup>16</sup>當然, 這裡的利益動機, 除了正面的訴求, 也可能有負面的考慮。譬如可以設想, 假如他們主動表明反對中國或者疏離中國,

---

[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3-08/15/content\\_255090.htm](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3-08/15/content_255090.htm)

<sup>12</sup> 莊國土：“華僑華人分佈狀況和發展趨勢”，《研究與探討》2010年第4期。

<sup>13</sup> “土耳其華僑華人概述 普遍認為新疆是故鄉”，見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zggj/2011/02-12/2839027.shtml>

<sup>14</sup> 李安山：““華人移民社群的移民身份與少數民族”研討會綜述”，《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會上，李安山用英文發表了專文；Li Anshan, "A Survey of the Studies on Ethnic minorities Huanqiao-Huare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0-2000)," Shen Yuanfang & Penny Edwards, ed., *Beyond China: Migrating Identities,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Division of Pacific and Asian History, RSPA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2, pp.90-106.* Pal Nyiri 和 Joana Breidenbach 編的 *China Inside Out: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一書中對李安山的上文也有所介紹。

<sup>15</sup> Elena Barabantseva, "Who are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China's Search for Transnational Ethnic Unity", *Modern China*, 38, 1 (2012): 78-109; Elena Barabantseva,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De-Centering China*, Routledge, 2010.

<sup>16</sup> 在我看來, 英文“Chinese”的中文翻譯至少有“中國人”、“華人”和“漢族人”的意思, 我的理解是受訪者這裡所說的“Chinese”多指“中國人”或“從中國的來的人”。但很多沒有中文背景的英語母語者在使用“Chinese”時, 大概只指“漢族中國人”, 我想這也是引起與會者爭議的一個原因, 因為會議語言是英文。

那麼就有可能會給他們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諸如失去顧客、諸如在返鄉或者與國內家人親戚的聯繫方面遭遇困難等。

但無論其動機如何，越來越多少數民族僑民注重與中國連結的現象，非常值得學者們進行研究。實際上，也正是針對這種現象，更鑒於海外華人主流傳統研究絕大多數都是針對漢族中國人、而不是非漢族的其他（相對與漢族的少數）族裔中國人的現狀，此次工作語言為英文的學術會議才確定了“Non-Han Chinese Diasporic Communities”的主題。

第三、中國政府對“少數民族華僑華人”也越來越重視。主管華僑事務的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以及相關省市自治區的外事僑務部門，一般並不對海外華人進行刻意的民族區分。但是，很多年前他們就開始注意並對少數民族華僑華人進行了專門研究。前面提到最早對“少數民族華僑華人”進行研究和呼籲的向大有、譚天星兩位學者都曾在省級和中央政府僑務部門任職。<sup>17</sup>過去十多年來，在中國最高級別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發佈的國家社科基金專案指南中，也可以發現相關的課題建議，諸如 2013 年出版的一本關於新疆籍華僑華人的書著，就是 2009 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研究成果。<sup>18</sup>

相關少數民族聚居的自治區各級政府，也都在通過各種措施支持相關少數民族華僑華人，並鼓勵和加強對他們進行研究。諸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外事（僑務）辦公室專門設有“愛疆獎學金”，用以資助包括埃及、土耳其等國家品學兼優的新疆籍留學生，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少數民族學生。<sup>19</sup>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 2014 年招聘專門從事“新疆籍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的工作人員，其中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蒙古族、柯爾克孜族、錫伯族、塔吉克族、達斡爾族、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俄羅斯族的應聘人員還有特殊的優惠考慮。<sup>20</sup>顯然是在鼓勵本身是少數民族的研究人員對本民族或其他少數民族華僑華人進行研究。

中國政府的努力不難理解，像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也在經歷着現代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而國家建構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內容則是民族建構（nation-building）。<sup>21</sup>伴隨着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影響的持續增加，隨着中國人越來越多地走向世界並逐漸接觸不同的民族，“中國人”到底意味着什麼的問題會是未來中國政府和中國民眾面臨的一個緊迫挑戰。近年來國內已經出現了關於民族政策的大討論。<sup>22</sup>在我看來，淡化族群差別、強化“國族建構”是一個不壞的選擇，似乎也是很多國家已經經歷過的歷史階段。<sup>23</sup>

在很大程度上，學者的任務在於解釋現象，而不是先入為主地根據自己的觀念、立場和視角來判斷和選擇現象。在我看來，上述三種現象足以說明：無論是作為一種學術概念、還是對海外華人身份認同變化的觀察、抑或中國的政府政策，“少數民族華僑華人”都已

<sup>17</sup> 向大有曾任廣西壯族自治區僑務辦公室主任，譚天星目前擔任國務院僑務辦副主任。

<sup>18</sup> 李德華：《移居國外的新疆人》，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sup>19</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伊斯坦布爾總領館，“關於申領 2012 年度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愛疆獎學金”的通知”，<http://www.fmprc.gov.cn/ce/cgtur/chn/xwdt/t979440.htm>

<sup>20</sup>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 2014 年度面向社會公開招聘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公告”，2014 年 12 月 22 日發佈，<http://www.cjob.gov.cn/sydw/8751.html?tableName=CB22>

<sup>21</sup> 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棟，最新的較好研究可以參加福山的作品。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第 11、12 章。

<sup>22</sup> 馬戎：“如何進一步思考我國現實中的民族問題——關於‘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討論”，《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4 期；胡鞍鋼、胡聯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5 期。

<sup>23</sup> 從國際關係史角度而言，這裡的“nation”最適合譯為“國族”，“國族建構”就是將不同民族或族群整合成一個現代國家公民的過程，但因為約定俗成的語言習慣，中文的“民族”概念，既包括基於血緣、語言、宗教、歷史、文化上的“族群”，也含有現代國家國民認同的“國族”。

經成為一個顯著的現象, 很有必要值得學術界進行系統研究與探討。

此次學術會議着實不易, 會議主要召集人李塔娜教授幾年前就曾對她所熟知的中國與東南亞相鄰地區的跨境民族議題發起過一次會議倡議, 但由於從事這方面的學者人數太少而回應寥寥。之後, 我們商議並嘗試將範圍擴大至整個中國延邊的跨境民族和海外僑民, 才終於促成了此次會議。我們相信, 如果能夠將此次參會論文以某種形式結集出版, 一定能夠有助於學術界加強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和進一步的研究。以上論述, 均為一孔之見, 希望得到同行的扶正。